改革论坛

充分发挥合作社对小农户利益的保护优势

【核心提示】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形式之一,在规模优势上与联合体、涉农企业联盟或者涉农行业协会等组织可能存在异曲同工,但在盈余分配、信用加持以及融资上存在显著特色与优势,是小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等主体合作事业深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于聪慧

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目标是通过农户之间的合作,以共同抵御自然以及市场等风险,而实践中往往存在着制约目标实现的因素。例如,不少合作社散、小、弱,无法有效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抱团取暖”作用发挥有限,合作社再联合显得尤为紧迫。但选择什么样的合作形式?如何有效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值得深入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以其全部财产对该社的债务承担责任;其成员以出资额为限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承担责任,赋予联合社法定的权利与义务。除了区别于企业法人及其他组织形式外,联合社在合作社发展与保护小农户利益上还存在独特的优势。

盈余分配优势,促使内部对小农户的保护更有保障。合作社再联合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联合社、联合体、涉农企业联盟、涉农行业协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导合作社横向联合和纵向联合,在区域内

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但联合后的规模效益、“1+1>2”的经济效益在盈余分配中对小农户的收入提高可能存在相对大的差异。实践中不难发现,被市场认可的、发展规模相对大的合作社,领办的主体往往是企业;中小型合作社如何突破发展困境,进行再合作与联合的组织协作,实现要素互补和资源整合同,同时拥有一定话语权和盈余分配的权利,联合社这一组织形式恰恰具有相对优势的选择。也正如有学者认为,联合社是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态。而大型合作社要继续发挥优势,联合社的组织形式使其可以紧密利益相关者,同时合作各方具有清晰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分配格局,在制度框架下可以制约“大鱼吃小鱼”的行为。合作社法律制度规定对于生产者(农户)的惠顾返还的强制性约束,使得合作社联合社在明晰分配盈余上存在制度优势,尤其着重保护小农户的利益。

信用增进优势,对外可以提高单一农户的信用。既然要对接大市场,那么在市场交易中主体性是很重要的形式体现,相比不管是联

合体还是涉农企业联盟、更不用说涉农行业协会,只有联合社作为特殊法人,以其社内财产对外承担责任,与其他市场主体才能在一个维度上进行竞争交易。在联合体、涉农企业联盟和涉农行业协会不具备市场主体资格的情况下,联合社从制度上可能也是最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的形式选择,对内合作,加入联合社的合作社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对合作社成员来讲有效缓解了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同时获得相应的主体参与权。对内或许是“联合体”的模式或者“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但对外采用联合社的形式才能取得其他市场主体的信任,不仅增强了联合社自身主体的信用,同时还可以增强成员社及小农户的信用,提高了作为市场主体的可信度,有利于获取更多的市场资源。联合体、涉农企业联盟、涉农行业协会这些组织在合作者的联合相对松散,不具有强制意义上的经济关联,在进行市场交易时,这些组织可以给每个独立交易的合作社以增信的价值,但是交易相对方仍然会评估与该合作社交易的风险

程度,加持的信用相对有限。与联合社的成员社交易还是与联合社交易,在交易中的违约风险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这也是为什么发展合作社之后存在再合作和联合的需求,实现更大规模的组织优势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很难对接的问题。

融资便利优势,增强联合社与小农户的市场主体优势。实践中,缺乏资金是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有部分联合社设立之初也是为了联保以获得银行的贷款。法律规定,3家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自愿基础上可以设立联合社,一方面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在社会关系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入联合社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系网络,建立更深的强关系,内在上,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信任程度增强,具有一定的组织归属感,进一步提升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更容易形成资金互助并约束内部信用风险;在经济关系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是一个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外在上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不仅仅是在交易中话语权

的提高,而且在金融领域得到相应的认可,获得更多融资的青睐,不仅是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给予相应的融资支持,还包括市场主体尤其是上下游企业的农产品融资、订单融资甚至预收融资等商业信用融资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现其融资功能程度取决于交易的信用环境以及资源机会的平等开放,而其融资功能的发挥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演进。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作为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形式之一,在规模优势上与联合体、涉农企业联盟或者涉农行业协会等组织可能存在异曲同工,但在盈余分配、信用加持以及融资上存在显著特色与优势;尤其是对小农户利益的保护,联合社从制度上给予强有力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有助于乡村组织振兴。联合社组织所表现出的诸多特点与优势是联合社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小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等主体合作事业深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摘编自《中国农民合作社》)

观察与思考

在醇美“年味”中增强文化自信

□秦平

春节的起源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年春节期间,文化乡愁浓烈释放。在各大年货市场、商超,众多国货品牌已纷纷推出“国潮”系列商品,从春节服饰到零食坚果,从老字号品牌到文创“新年货”,无不披上了中国风、虎年生肖等“国潮”元素的外衣,吸引了一众年轻消费者。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家强。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留下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春节”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百节年为首”。春节等传统节

日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元素,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而今从习俗传承、载体创新、世界影响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14亿多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

从习俗传承中感受文化自信。“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历经5000多年而不衰,就在于我们没有抛弃传统,没有割断精神命脉。春节历史悠久,在传承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习俗。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而今历经岁月洗染,贴年红、守岁、吃团圆饭、拜年等习俗也是代代传承,凸显出浓浓的文化自信。

从载体创新中感受文化自信。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伴随着社会发展脚步,春节习俗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比如,随着互联网不断普及,短信祝福、网络贺年、视频拜年就越来越成为“新年俗”。再比如,健身、读书等各式过年潮流,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过年“标配”。传统民俗在与互联网的融合中锻造出了新的时代内涵,春节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年轻一代的喜爱和青睐。

从世界影响中感受文化自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华文化的魅力也日益渗透到全世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20个国家和地区把

中国春节定为整体或者所辖部分城市的法定节假日。中国创造、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魅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全世界的养分库,让中华儿女更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汲取着建设、改革的伟大力量,越来越激荡着民族自尊、自强与自信。今天,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勇气,向着美好生活的幸福彼岸逐梦前行。让我们一起品尝醇美的“年味”,打造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在强大文化自信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摘编自《群众新闻》)

各抒己见

农业固碳减排潜力巨大

□李周

能源和工业是我国碳排放主要来源,实现“双碳”目标主要途径是通过改进工业部门技术以及逐步使用光伏、风力、水力等零碳能源替代碳基能源来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与此同时,农业对我国“双碳”目标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原理来看,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可以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存储二氧化碳,植物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后,并不能完全存储下来,有一部分会随着植物和土壤的呼吸释放出来,植物死亡等也会释放一部分碳,剩余存储的二氧化碳被称为碳汇。2021年到2060年,我国生态系统仍处在新增碳储量显著多于碳排放量阶段,保护修复森林、草原、湿地等资源,可以增加碳汇,为实现“双碳”目标作出贡献。

减排方面,我国农业领域承担着重要的减排责任。一方面,推动农业低碳发展应在保障粮食安全、食物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施肥用药减量化和畜禽粪污、秸秆资源化,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拓宽城乡非农就业和增收渠道的前提下,降低农民增收对农产品附加价值的依赖性,降低农产品加工能耗、运输能耗和储存能耗。以发展农产品低碳运输体系为例,在完善联运网络和健全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上,通过优化运输线路,改良运输方式和方案等措施降低食物流通环节的碳排放。此外,鼓励绿色消费。建议消费者尽可能增加鲜活农产品的消费比重,减少冷链能耗造成的碳排放,坚决杜绝餐饮浪费行为。(摘编自《中国乡村发现》)

□金观平

如果单算经济账,耕地的非农业利用收益的确比农业用途高,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都比农业用地“吃香”。地方政府如果把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既有前期的土地收入,又有持续的税收,还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但是,14亿多中国人离不开粮食,耕地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民族永续发展。因此,在耕地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不能只算局部账,不算全局账;不能只算眼前账,不算长远账。要正确和全面认识我国耕地现

状。我国人多地少水缺,人均1.4亩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成。且一年三熟的耕地仅占15%,近半耕地仅一年一熟;耕地质量本底不高,中低产田面积较大,近半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地区。近年来,耕地布局持续北移,光热水搭配更好的南方耕地占比下降,北粮南运趋势明显。加之后备耕地资源有限,短期内补充耕地难度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国土“三调”数据显示,全国耕地19.18亿亩,已逼近18亿亩耕地红线;10年间耕地减少1.13亿亩,与“二调”相比,年均减少面积在扩大。近年来,宝贵的

耕地在一些人眼里成了“唐僧肉”,一些地方违规占用耕地植树造林、挖湖造景,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一些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改变用途,严重冲击耕地保护红线。由此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农田就是农田,不能挪作他用。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应当明确,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菜等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非农建设不得“未批先建”,那些违法侵占的,必须“完璧归赵”。对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

用或者改变用途,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的,经依法批准,应落实补划任务。

农田须是良田,不能以次充好。打好耕地保护组合拳,要守住数量和质量“双红线”。提高耕地质量更有必要性和现实针对性。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耕地质量的有力抓手。在实施中,要注意提高建设水平,完善建后管护机制。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耕地不是任人觊觎的“唐僧肉”,而是全国人民的“大熊猫”,要给耕地保护增加“护身符”,给非法占用戴上“紧箍咒”。(摘编自《经济日报》)